

投资 促进发展

投资女性健康和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大卫·E.布卢姆、迈克尔·库恩、克劳斯·普雷特纳

投资于女性教育和健康以及关注女性就业机会和权利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回报。

然而，男女平等与全球标准相去甚远。在低收入国家，上学的女童比男童少（36%比45%）；尼日尔（17%）和南苏丹（7%）的女童入学率尤其糟糕。在所有人口和社会经济群体中，印度在女性健康方面的花费比男性要少（Saikia、Moradhvaj 和 Bora, 2016）。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女性在企业 and 政府中获得领导职位的机会更少。截至2016年，各国女性在议会所占的席位还不到1/4，目前只有15名女性担任国家元首（不包括名义上的首脑）。只有一半的劳动适龄女性处于正规就业，而劳动适龄男性的该比例达到3/4。

但卢旺达是一个明显的例外。1994年种族灭绝屠杀事件后，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

总统发起了一系列对女性有利的改革。性别权利现在被写入宪法。女性在议会占据了近2/3的席位，占中学注册人数的52.5%，占劳动力总数的54%，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过去的20年，卢旺达在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显示，卢旺达在男女平等方面排名第五，仅次于冰岛、芬兰、挪威和瑞典，远远领先于加拿大（第35名）、美国（第45名）和澳大利亚（第46名）（但是，对待性别角色的传统态度在家庭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家庭暴力仍然是卢旺达各地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对女性的投资可能为卢旺达近期取得的经济方面的成功做出了贡献。2000年到2015年期间，卢旺达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远远超

女性， 展



照片-BULCKWINKEL / ALAMY STOCK PHOTO

健康的女性更有可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她们拥有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和精力，而且工作时间也更长。

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

这种性别与发展间的联系在其他国家也有体现。在世界各地，性别不平等程度（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来衡量）最低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要比性别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得多（见表）。虽然难以完全证明性别平等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也符合事实（Diebolt 和 Perrin, 2013）。

性别平等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效指标。因为繁荣带来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为医疗卫生保健和教育提供了资金，而医疗卫生保健和教育又鼓励了劳动力参与，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此外，

经济保障也提高了家庭和自主权。

这种积极的动态变化可能会鼓励那些单纯靠时间来实现性别平等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风险：第一，该方法缺乏人权根据，因为对未来社会更公平正义的承诺忽视了那些今天受到伤害的人。第二，该方法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能够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第三，该方法忽视了性别平等能够帮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事实，因为女性对经济的贡献规模很大并且能够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对女性的投资（尤其是在其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肯定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

公平的回报

各地区性别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比性别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

性别不平等		
地区	GII最低的国家 (人均GNI)	GII最高的国家 (人均GNI)
阿拉伯国家	阿联酋 (67,330美元)	也门 (3,740美元)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新加坡 (79,660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 (2,800美元)
欧洲和中亚地区	斯洛文尼亚 (30,360美元)	格鲁吉亚 (9,130美元)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智利 (21,470美元)	海地 (1,740美元)
南亚地区	不丹 (7,330美元)	阿富汗 (1,960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卢旺达 (1,640美元)	尼日尔 (930美元)

资料来源：性别不平等数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4年性别不平等指数；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世界银行《2014年世界发展指标》。
注：GII是指性别不平等指数；GNI是指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以购买力平价（现值国际美元）表示。

促进经济

女性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其中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参加工作。女性参加工作可以促进生产，并且随之而来也会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收入、储蓄、税收做出贡献，其贡献的大小取决于有多少女性参加了有偿工作、她们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她们的生产率高低，而生产率又取决于教育、培训和健康。

学术研究支持教育（尤其是对女性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受教育的女性可以享受更安全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就可以提高10%到20%）。而且，受教育女性的农业产量更高，她们（及其子女）的死亡率也更低。世界银行2014年的一份由克劳迪奥·蒙特内格罗（Claudio Montenegro）和哈里·帕特里诺斯（Harry Patrinos）撰写的报告发现，平均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可使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分别提高11.7%和9.6%。这些结果与那些表明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宏观经济学证据相一致。此外，正式



参与卢旺达基加利“女性互助”项目的女性正在进行缝纫作业。

和非正式的在职培训也会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产率。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更依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因此教育和培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健康也很重要，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健康的女性更有可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她们拥有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和精力，而且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健康的女孩可以获得教育的所有回报，对未来的生产率和收入产生影响。因为教育鼓励女性对自己的健康投资，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又会延长寿命，并拥有更好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从而提高教育的回报。

此外，提高女性获得资本、报酬和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体制和文化变革可以促进女性通过劳动做出直接的经济贡献。而且，能够支配自己收入的女性工作起来可能更努力，工作时间也更长。

另一方面，女性也可以通过无偿劳动对经济提供支持，尤其是在家庭中。她们生儿育女，并

往往自行或者按照社会的约定俗成承担着主要的养育儿女的责任。她们还照料家庭中的长辈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女性要取水、做饭、做其他家务，并且自愿参与社区事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分别比男性平均要多 30 分钟和 50 分钟。

女性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间接的贡献。从长期来看，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将社会从高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率，因为能够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生育很多子女的动机。调查显示，一般女性更喜欢拥有较少但受教育程度高和更健康的子女，而不是拥有数量多、受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较差的子女。而在社会和家庭中拥有影响力的女性可以将这种偏好付诸实施。

这种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

的和长期的影响。随着生育率开始降低，青年抚养比也降低，因此，人均社会产出上升，出现了所谓“人口红利”的潜力：家庭的储蓄和投资上升，政府可以对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生育率下降后的第一代儿童更健康，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因此也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的人力资本会促进社会从高生育率、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不佳的状态向低生育率、受教育程度高和健康状况良好的状态转变，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各收入国家群体的生育率都出现了下降，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最低，在这些国家，生育率变化和经济影响更加显著。

女性健康状况及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可以影响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健康、教育和幸福感。最新的研究发现，母亲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改善子女的认知发展、行为和学习成绩，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生产率。而根据以前的研究，如果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比例更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家庭支出用于家庭成员的健康，这将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一项对科特迪瓦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家庭往往会增加花在食品上的支出，并且减少在烟酒等有害商品方面的支出（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

母亲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改善子女的认知发展、行为和学习成绩。

女性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如果女性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充分的授权，她们就更有可能在社区中担任领导的角色。此外，对女性的教育还能够促进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从而对经济的长期繁荣产生积极影响。参加工作的受教育女性对非民主政体宣传的性别不平等的容忍度更低，而且可能会推动更加具有响应性的领导层的出现。参加工作还可

以让女性与家庭以外的人展开交流，以及组织政治行动。

对女性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可以产生良性循环，因为随着更多的女性开始工作，社会对女性参加工作的看法也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例如，由参加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的男性有可能更愿意分担家务劳动，从而让女性外出工作变得更容易，而且这些男性也更有可能会对女性参加有偿工作持积极的态度（Fernández、Fogli 和 Olivetti, 2004）。

让理想变成现实

愿意对女性投资和改进经济绩效的国家有很多可选的政策。很明显，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就是其中之一。

教育非常关键。学费的下降以及针对学生入学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都有助于让家庭认识到送女孩上学是负担得起的。此外，中学里的自来水、冲水厕所和卫生用品也可以吸引女孩上学，而建设更多的学校来减少上学出行时间也能鼓励女孩上学。

除了为普通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资金之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支持也能产生长远的经济效益。例如，对计划生育的投资（如提供优质避孕用品）

和实施晚婚政策（如禁止童婚的法律）都可以帮助降低生育率。

尽管本文列举的具体可选政策主要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但高收入国家也能通过采取干预措施来促进和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位），并从中受益。在各收入国家群体中，改进公平的努力是最有可能产生效益的，但这些努力应该与培育高效的劳动力及资本市场以及提

供基本劳动保护的一般宏观经济政策一同实施。

经济理由

综合来看，健康、教育、授权赋能和经济福祉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本身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二者结合起来的效果非常显著。这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均是如此。但是，如果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让女性陷入教育程度低的恶性循环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投资，其效果会令人震惊。

虽然人力资本是各国最大的资产之一，但是必须对人力资本进行良好的管理，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女性的经济贡献，无论是在有偿劳动或无偿劳动方面，是以较小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还是更稳定的社会等形式来体现，都能够改变经济成果。因此，对女性的投资不只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也是可产生经济效益的明智之举。FD

大卫·E·布卢姆 (DAVID E. BLOOM) 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教授。迈克尔·库恩 (MICHAEL KUHN) 是维特根斯坦中心和维也纳人口统计学研究所人口经济学研究小组的共同负责人。克劳斯·普雷特纳 (KLAUS PRETTNER) 是霍恩海姆大学经济研究所增长与分配部门负责人。

参考文献：

Diebolt, C., and F. Perrin. 2013. "From Stagnation to Sustained Growth: The Role of Female Empower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545–49.

Fernández, R., A. Fogli, and C. Olivetti. 2004.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Female Labor Forc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249–99.

Hoddinott, J., and L.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Saikia, N., Moradhvaj, and J. K. Bora. 2016. "Gender Difference in Health-Care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India Human Development Survey." *PLoS ONE* 11 (7).

《金融日记：美国人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世界》

Jonathan Morduch 和 Rachel Schnei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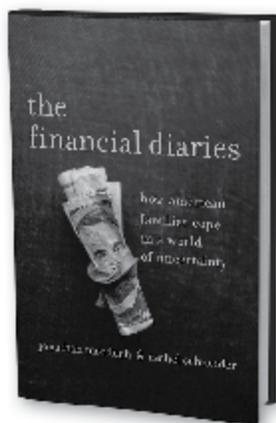
“《金融日记》是理解工薪阶层家庭对其金融情况感到不满的原因的重要的框架。它列举了区分流动性不足和破产之间区别的重要例子，以及为什么其应对的政策方案有所不同。”

——Elisabeth Jacobs,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

“《金融日记》达到了最罕见的目的：让人在思考问题时并同时关注问题。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书，带领我们深入探究这个时代的经济不确定。”

——Jacob S.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一书的作者

精装, 27.95 美元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登录 press.princeton.edu 查看电子书